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與 中國的國際化

• 徐國琦

中國近代體育的「奧林匹克之夢」和幾代中國人如何利用西方體育來改善中國的命運、重塑國家認同及提高在國際上的地位密不可分。1907至1908年中外人士提出的「奧運三問」，實際上側重於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生存能力。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興起與近代中國尋找新的國家認同及國際化的開端幾乎同時發生。1894至1895年間的甲午一戰，中國慘敗於日本之手，從此讓中國人從四千年大中國夢中覺醒，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根本不是甚麼所謂「天朝大國」，而是「東亞病夫」^①。可以說，十九世紀的中國人從頭到腳，從裏到外都出現問題。男人頭纏長辮，幾百年來汲汲於科舉考試，滿腦子孔孟之道，以白面書生、四體不勤為榮，頭出現了問題，陽剛氣更是欠缺。中國女人從明清以降，以三寸金蓮為美，以弱不禁風、一步三搖為自豪，裹腳的風俗導致近半中國人屬於殘疾之列。病態的男人與殘疾的女人，必然導致病態的國家。嚴復、梁啟超、張伯苓等先哲開始大力鼓吹中國人要向西方學習，根治中國人的頭腳痼疾，重塑國人形象，尋找新的國家認同。以西方為目標的國際化進程在中國開始啟動。這一巨大思維變化，為中國人接受西方的思想及體育理念打下良好基礎。

就在中國甲午戰敗、人心思變的同時，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於1894年在法國問世，兩年後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雅典舉行。但奧林匹克運動最先被介紹到中國，倒不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功勞，而是與另一個國際組織——基督教青年會(YMCA)密切相關。1895年，基督教青年會首次在中國的天津市設立分會，並大力推廣西方體育，籃球、排球等現代體育競技運動一一被引進中國。後來的天津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之成為中國奧林匹克運動的先驅，被當代中國人炒得沸沸揚揚的所謂「奧運三問」之所以出現在天津，都是跟基督教青年會天津分會密不可分的^②。甚至近代幾乎所有中國的體育領袖都或多或少與基督教青年會有關。中國之所以在1922年成為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一員，同年王正廷之成為首位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中國委員，1910年開始的全國運動會之所以能堅持下來，凡此種種，都與基督教青年會的領導及參與密不可分。這也說明，中國的奧運

情結從一開始就是與其國際化進程有關。換句話說，中國之捲入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歸根到底是其尋求國際化的產物。

一 百年一夢

質言之，中國近代體育的「奧林匹克之夢」和幾代中國人如何利用西方體育來改善中國的命運、重塑國家認同及提高在國際上的地位密不可分。1907至1908年間中外人士共同提出的「奧運三問」，實際上並非着眼於中國的體育競技實力，而是側重於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生存能力^③。從晚清到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百年間，一根三朝共享的清晰主線就是體育的政治化。自1895年以來，中國人一直以西方的國家認同體系及價值觀為參照系和依歸，其意欲通過參與奧林匹克運動等各種方式加入西方主宰的國際體系即為明證。

中國最早的關於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系統介紹書籍，即用《我能比呀》作為標題。其編者宋如海（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在介紹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時用「我能比呀」來翻譯Olympiade，可謂既傳神又得體，充分反映中國人希望被外人承認及走向世界的迫切心態^④。1932年中國第一次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更是與國際政治有關。中國最初本無計劃派運動員躬逢盛會，但有關日本可能藉以滿洲國的名義參賽來變相使滿洲國在國際社會中合法化的消息，讓許多中國人義憤填膺，並最終促成劉長春1932年單刀赴會洛杉磯奧運會的壯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的國際地位一時得以空前提高。一時的大國心態導致部分

國人思考如何有大國作為。王正廷、董守義、張伯苓等人打算藉申辦1952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來鞏固大國地位，展示中國的大國作為^⑤。可惜，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讓這一計劃胎死腹中。

1949年蔣介石政府因內戰敗北，不得不遠走台灣。但中國體育的政治化因此更為複雜，因為海峽兩岸的兩個政府都宣稱代表中國，譴責另一個是偽政府。世界冷戰格局讓「兩個中國」問題更為複雜難解。國際奧林匹克運動因為「兩個中國」問題差點解體。在「漢賊不兩立」、「有它無我，有我無它」的思想支配下，海峽兩岸從1949到1979年這三十年間利用國際奧林匹克運動這一平台，展開無休無止、無所不用其極的外交較量，讓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無所適從，疲於應對^⑥。

1952年的赫爾辛基奧運會可謂兩岸在國際冷戰格局下施展政治角力的首次較量。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最初由於對兩岸誰代表中國搞不清楚，先是決定都不邀請與會，打算奉行駝鳥政策。在各方的抗議下，國際奧委會被迫改弦易轍，邀請北京及台北雙方

北京1952年赴赫爾辛基奧運會不是為了比賽，而是為了政治需要，為了向世界展示北京代表中國，強烈反對台灣在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中佔用一席之地。圖為對「我能比呀」的介紹。

OLYMPIADE

「我能比呀」

按“OLYMPIADE”原係古希臘運動會之名稱，世界運動大會仍沿用之。『我能比呀』雖係譯音，要亦含有重大意義。蓋所以示吾人均能參與此項之比賽。但凡各事皆須要決心，毅勇，便能與人競爭。

金牌至上、舉國體制、「國內練兵，一致對外」是1980年代後中國體育的新政治。這一政治和「奧運三問」的背景是一脈相承的。不同的是，北京意在通過體育賽事讓共產黨政權合法化也是一個重要考量。

參加。但北京直到奧運會開幕的前一天才收到邀請。台灣對奧林匹克委員會邀請大陸的決定很是不滿，以拒絕參加表示抗議。此舉正中北京下懷，代表團立即收拾行裝與會。雖然直到閉幕式的前一天才趕到赫爾辛基，因而事實上未能參加任何重要比賽。此舉讓人難以理解北京與會的初衷，但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的話來說，遲到不是北京的錯誤，能把五星紅旗插到奧林匹克會場即是勝利。顯然，北京的赴會根本不是為了比賽，而是為了政治需要，為了向世界展示北京代表中國，展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強烈反對台灣在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中佔用一席之地。

但當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拒絕把台灣逐出奧林匹克大家庭後，北京在反對「兩個中國」的政策下於1958年退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直到1979年，北京才重返奧林匹克大家庭。在此二十一年間，北京因政治考量拒絕參與絕大多數重要的國際體育盛會。體育的政治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更變本加厲，在體育比賽中奉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政策就是明證。體育還成為中共操縱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砝碼。1971至1972年毛澤東對美國展開的乒乓外交可謂其中經典範例。

1979年北京重返奧林匹克運動及其他主要體育賽事後，利用體育向世界展示一個開放的新中國，力圖用奧林匹克金牌數目來證明中國是強國。金牌至上、舉國體制、「國內練兵，一致對外」成為1980年代後中國體育的新政治。這一政治和二十世紀初的「奧運三問」的背景是一脈相承的。唯一不同的是，北京意在通過體育賽事讓共產黨政權合法化也是一個重要考量。在1907至1908年間，中國人公開

提出中國何時可以舉辦奧運會的問題。2008年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十九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可謂中國人百年奧運夢的圓夢之年，也是百年中國人追求國際化的顛峰之時。

2008年奧運會屬於中國，更屬於世界。遺憾的是，一些西方國家、政客、媒體、組織，出於各種考慮，對中國主持的這一世紀全球盛會，並不是樂觀其成，而是橫加挑剔，百般干擾，竭盡破壞之能事。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國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從技術層面上說，北京可謂成功舉辦了一屆讓世人矚目、無與倫比的精彩奧運會。2008年也必將因此成為中華民族百年來為實現國際化而上下求索的轉折點。奧運會的口號是「更高，更快，更強」。全體中國人本來應該藉奧運會的巨大成功來心平氣和地反省，為甚麼國際社會對中國存在許多誤解或敵意，並進而藉奧運契機，把握這一歷史機遇，再造一個更為自信、自尊、自強、寬容、祥和的民族家園，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中國政府的政策似乎離該目標還是很遠，似乎毫無反省、檢討的胸懷。國家體育總局的領導人更是在北京奧運會後聲稱體育的舉國體制要繼續實行下去，現行體育政策無改弦易轍之必要。

二 金牌第一的世界病夫

雖然中國在1932年即參加奧運會比賽，但直到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上才拿到首枚金牌。令中國人喜不自勝的是不僅拿到了金牌，而且在此屆奧運會上，由於蘇聯及其盟友的抵制，中國一舉拿到十五枚金牌，可謂開門紅。舉國欣喜若狂，開始自認為

體育大國。也正是在此奧運會上，中國向全世界正式宣布要舉辦奧運會。可惜好景不長，在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上，由於蘇聯等體育強國參加，中國僅得到五枚金牌，舉國情緒失落，認為「兵敗漢城」。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上，中國發奮圖強，拿到五十一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比屈居第二的美國高出不止一籌。國人頓時感覺飄飄然，春風得意。

但這是否意味中國是體育超級大國了呢？根本不是。首先，五十一枚金牌是舉國體制的產物，是無數運動員、教練默默奉獻、甘當陪練的結果，甚至用犧牲金牌得主的青春及幸福來取得的。金牌數量根本不能反映中國體育的總體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國在重要體育項目上根本無法與體育強國媲美。這一點尤其反映在足球、籃球、排球所謂「三大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體委主任賀龍元帥曾表示三大球不上去，他死不瞑目。賀龍在天之靈恐怕現在眼睛還睜得大大的，因為三大球仍未上去。男排、男籃、男足尤其落後。如果以三大球及田徑成績為衡量一國是否體育大國的標準，中國不僅不是體育強國，甚至可以說是世界病夫。許多彈丸小國都比中國強。

其次，為甚麼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不能找出十一人的足球隊，可以和世界任何強隊分庭抗禮，一決雌雄⑦？為甚麼一個因「東亞病夫」的頭銜激勵了幾代中國人奮發圖強，最終實現「奧運三問」的每一個目標的國家，到頭來還是病夫，甚至是世界病夫？為甚麼一個奧運金牌排名第一的國家的三大球可以任人宰割，而無還手之力？在三大球上，中國人的「我能比呀」的雄心何在？在五十一枚金牌的

炫耀下雄心萬丈的中共領導人對上述問題又作何解釋？鄧小平為超級足球迷，多年前他就英明地指出，足球要從娃娃抓起，他老人家可以拯救中國經濟，但為甚麼就是無法拯救中國足球？為甚麼中國為舉辦奧運會，不惜投資萬億，不惜工本、成本，但許多農村無錢蓋校舍、建體育場？許多農民的孩子無法上學？為甚麼一個能夠創造經濟奇迹的國家不能提供至少是二流國家的全民體育設施？難道我們不應該好好反省思考麼？

更有甚者，1985年以來的各種報告都顯示，中國國民體質不升反降。中國的醫療改革事實上已經失敗，窮人不敢看病，富人禁不起生病，救命藥經常成為奪命藥。須知一個體育大國首先是一個國民體質強健的國家，民強才能國富。在中國人普遍體質不好的情況下，在國民人均體育經費及設施在全球殿後的情況下，在家長及學校普遍不重視體育的情況下，自稱體育強國可謂自欺欺人。要知道，一個連教育都沒有普及的國家是沒有資格談甚麼體育強國的。

中國崇拜金牌，在相當程度上是不自信的體現。加拿大為1976年夏季奧運會舉辦國，卻在自己的運動會上，一枚金牌未得，但這根本不妨礙加拿大人舉國健身及對其國家和個人認同充滿信心。印度直到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上才拿到個人首枚金牌，但印度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並不會因為其拿到或拿不到奧運金牌而改變。前民主德國可謂體育強國，但因為自己的政治制度的缺陷最終還是不得不被聯邦德國兼并。前蘇聯可謂體育超級大國，但1991年因為政治問題解體。凡此種種，中國人特別是中共領導人難道不應吸取教訓嗎？

一個體育大國首先是一個國民體質強健的國家，在中國人普遍體質不好的情況下，在國民人均體育經費及設施在全球殿後的情況下，自稱體育強國可謂自欺欺人。

中國之所以是一個金牌第一的世界病夫，病根在於其缺乏獨立的國家民族認同。自十九世紀以來，無論是在國際關係體系中，還是文化意義上的價值認同方面，中國都失去了獨立基調，並處於邊緣地位。

不言而喻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只有強壯的國民，才能組織強壯的國家。強壯的國民不僅是身強力壯，而且有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和敢於挑戰自我與權威的魄力。今天的中國人大多做不到這些。他們不敢越位思考，在體育上，不得不聽命於國家體育總局許多自命不凡但根本不學卻有權術的外行領導。在民主方面，中國人沒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現行的政治體制強迫他們唯唯諾諾，無法成為頂天立地的強者。正如筆者在近著《奧林匹克之夢》(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中指出，一個崇拜金牌的國家不是一個自信的國家；一個國民不能獨立思想的民族不是一個強大的民族；一個不讓自己的國民在精神和身體都健全發展的政府，不是一個自信政府；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度，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體育強國。今天的中國，充其量是一個金牌第一的世界病夫^⑧。

三 中國化與國際化

中國之所以是一個金牌第一的世界病夫，病根在於其缺乏獨立的國家民族認同^⑨，在國際上缺乏一種特立獨行、以我為尊的主心骨。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一直跟在洋大人後面爬行。自1907至1908年提出「奧運三問」以來，一百年過去了，幾代中國人的世紀奧運會主辦夢終於在2008年得以實現。夢圓之日也是夢醒之時！也是反思一百年中國走向國際化艱難曲折歷程的最佳時機！中華民族在國家認同、價值取向、外交戰略諸方面，正面臨着迫在眉睫的挑戰。何去何從，關係到中國能否自立自強於世，並進

而長盛不衰、長治久安的大問題。中國應該利用成功舉辦2008年奧運會的歷史契機，打破以西方為參照系的百年求索軌迹，重建國家認同新架構，樹立中國文明體系，塑造中國獨立國格，以不卑不亢、挺拔自信的姿態和世界文明平等對話，共創二十一世紀人類新秩序^⑩。

自十九世紀以來，無論是在國際關係體系中，還是文化意義上的價值認同方面，中國都失去了獨立基調，並處於邊緣地位。在此提出中國獨立這一概念，旨在引起國人對此問題的關注，喚起所有炎黃子孫對中國獨立發展戰略的關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全球、全中國對北京奧運會有着良好印象的時刻，中國應該利用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全面審視「何為中國人？何為中國？」這一百年命題。二百多年前的1793年，英使麥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請求中國和英國建立平等的外交及經濟關係，我們因為盲目及無知，妄自尊大，失去了一次參與國際平等對話及建立中國在國際社會平等地位的歷史契機。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再也無法付出重蹈覆轍和盲從別人的高昂代價。中國，曾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自十九世紀初以來，中心大國失去了活力，並逐漸淪為配角及挨打的對象。中國人直到今天仍未改變這一邊緣化局面，因為西方似乎一直掌握「何為中國人？何為中國？」問題的話語權，並主導對此一問題的討論。

這種由上國淪為邊緣是一種不自覺的過程。1840年代英國人以船堅炮利把古老的中國強制拉入國際社會。從此，中國失去了自己的重心，在完全由別人操縱的一個完全不同的文

明體系裏，失去自我，無所適從。洋務運動是中國人試圖扭轉這一尷尬處境的最初反應，可惜事與願違。到十九世紀末，中國的處境每況愈下，並因此引起嚴重的國家認同危機。向西方學習，力爭加入西方的認同機制，成為大多數先進中國人追尋的救國方向。辛亥革命後，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政體正式退出歷史舞台，作為中國傳統文明核心價值體現的儒家思想被拋棄，亞洲第一個共和政體在中國建立。這是一個刻意效法美法政治的時代，而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建立標誌着中國邊緣化的新階段，即由鴉片戰爭以來的迴避西方制度，轉為加入西方模式，進而力爭加入國際社會，以便最終實現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非邊緣化。

1912到1919年間，可謂先進中國人全心全意繼續甘做西方學徒的時代，他們借用西方特別是美法的制度來擺脫其在國際社會中的邊緣地位。在幾千年文明史中，中華民族第一次以西方為參照系來核定自身的地位，試圖加入一個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文明基礎之上的國際體系。在這一期間，一大批受到良好西方學術訓練的留學生回國任職，身居要津。當時的國際環境也對中國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歐洲列強無暇他顧，給身居邊緣及不獨立的中國，在外交上提供了轉圜的餘地。美國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為了和歐洲強國爭奪國際關係的執牛耳地位，提出許多對中國等處於邊緣地位的國家有誘惑力的主張，例如其鼓吹民族自決、公平外交的十四點，公理戰勝強權等。這些很能在中國引起強烈共鳴的言論，也給中國爭取打破枷鎖，走向國際社會，提供了根據。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外交充滿了理想色彩，把全部希望寄託在美國及西方身上。連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都曾大喊威爾遜是世界上頭號大好人，遑論其他人了。令人遺憾的是，在巴黎和會上，公理並未像中國人期望的那樣戰勝強權，而是一切照舊，強權即公理。山東問題未得到解決，列強仍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巴黎和會帶給國人的教訓是，西方靠不住。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如陳獨秀、孫中山、梁啟超等人對西方感到失望，開始尋找新的救國良方。源於西方但反對西方正統價值理念的一套意識形態及理論體系——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引起許多激進中國人的濃厚興趣。基於這一理論的俄國十月革命，也因此成為仿效對象。經過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及艱苦卓絕的追求，多災多難的中國終於和西方理論的異端(馬克思列寧主義)結為連理，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①。

然而，中國人並沒有真正站起來。中國把自己的命運和社會主義連在一起，就注定我們無法真正站起來。首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西方的產物，中國把自己的國家認同和源於西方、但被西方唾棄的思想捆綁在一起，不但是不自信的體現，而且是病急亂投醫的結果，是一段同牀異夢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其不圓滿的困局。1949年後，中國得到的只是行政及主權獨立，但中國在國際上的邊緣化地位依然未改。在政體上，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實乃西方的概念。在意識形態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掛帥，顯然又是西方的產物。問題的關鍵倒不在此，癥結是，這些結合並沒有幫助中國擺脫邊緣化的困境。

1949年後，中國在國際上的邊緣化地位依然未改。在政體上，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實乃西方的概念。在意識形態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掛帥，又是西方的產物。這些結合並沒有幫助中國擺脫邊緣化的困境。

在十九世紀，中國因為拒絕接受西方的文明體系，導致中國的邊緣化。在二十世紀，左右兩派過份以西方的一切為依歸，同樣導致中國的邊緣化。學習西方的文明應僅僅是我們的手段，而不應是目的。

如果說，在十九世紀，中國人為苟求國運於亂世，不惜委曲求全，成為西方的附屬物，那麼，在1949年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形勢並未得到多大改變。建國之初，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生存，不惜在外交上一邊倒，甚至甘願充當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所謂第二小提琴手。到1960年代初，中國與兩大超級強國對抗，甘願游離於國際體系之外，但卻在思想上、外交上充當無產階級革命的急先鋒，導致了中國進一步遭受孤立和在國際社會中的高度邊緣化。

直到今天，中國人的自慚形穢、病急亂投醫的現象並未徹底消失，政治心理情結上的邊緣化繼續存在。無論是那些主張西化派，抑或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儘管名義上分列兩大不同陣營，貌似水火，不共戴天，實際上在導致中國邊緣化方面殊途同歸。袁世凱要稱帝，還得搬出一個美國教授古德諾 (Frank J. Goodnow) 來搖旗吶喊，借其之口為自己登基造勢。這位教授的一篇論及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中國的文章儼然成為袁氏可以南面稱孤的護身符。無獨有偶，在現代，曾幾何時，那些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也動不動就援引馬、恩的隻言片語來嚇人，彷彿他們的話是靈丹妙藥或聖旨。甚至在今天，現代的唯洋獨尊派在分析中國問題時，也是如法炮製，好像洋人的話就是金科玉律，儘管這些洋人也許對中國問題一竅不通。

歷史的怪圈，似乎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為甚麼？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近百年來在精神上一直彎腰匍行，不能徹底站起來，眼前只有西方這個參照系，無法「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如果十九世紀中國的落後挨

打，是由於坐井觀天，夜郎自大，未能順時應變，那麼二十世紀以來的國人，則因為過於妄自菲薄，而為西方所左右。在十九世紀，中國因為拒絕接受西方的文明體系，導致中國的邊緣化。在二十世紀，左右兩派過份以西方的一切為依歸，同樣導致中國的邊緣化。

從歷史的角度看，也許這兩個邊緣化是某種必然的歷史過程，是我們應交的學費。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該是我們中華民族畢業的時候了。「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讓我們藉勝利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之際，徹底揚眉吐氣，走出一條以中國為中心、為參照系的康莊大道來。學習西方的文明應僅僅是我們的手段，而不應是目的。梁啟超很早以前就奉勸國人要「學為中國人，學為世界人」。康有為提醒我們應該「泯中西之界線，化新舊之門戶」。嚴復提出中國要「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孫中山則大聲疾呼：中國人要「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魯迅的藥方則是「外之既不後於世界文化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的今天，中國人應該有能力、有魄力找出一條獨立之路，來實現中華民族真正意義上的偉大復興！

我們不再需要向世界證明自己，不再一切唯西方馬首是瞻。讓我們首先厚待自己，特別是自己的國民。讓我們享受奧運會及一切競技比賽，中國運動員勝了，很好；輸了，中國依然是偉大民族。只有自信的民族，才是偉大的民族。只有自尊的民族，才能享受別人的尊敬。只有在運動場上輸得起的民族，才是真正會贏而且能

贏的民族。只有信任本國公民的政府，才會受到別國的信任。本末是不能也不該繼續倒置的^⑫。

2008年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事實證明，這是一個一廂情願的妄想。在距1907至1908年的一百年後、中國人終於實現「奧運三問」所有目標之際，該是重新審視檢討一百年的國際化軌迹，重新思考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的國家認同的時候了。國際化的真諦首先是中國化，中國化是國際化的終極目標。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六十年該是早已過了不惑之年，也過了知天命之年了，我們該集體思考甚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命，甚麼是中華民族的天命，甚麼是我們所有中國人的天命。只有對天命有了清晰的定義後，中國的國際化才不會繼續走彎路，中國人才會真正站起來，才會真正成為體育及政治強國。

註釋

① 首先系統提出中國是東亞病夫的人是嚴復。他在1895年春詳細解釋為甚麼中國是東亞病夫。

②③ 詳情參見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所謂「奧運三問」一文發表在基督教青年會天津分會會刊《天津青年》。發表該文的雜誌現已不存，筆者曾到包括天津圖書館等中國國內諸多圖書館及位於美國明尼蘇達的基督教青年會檔案館查證此文，均告不復存在。最權威的間接根據是讀過此文的吳志剛的研究，他的1956年密西根大學博士論文引過此文。但究竟是中國人先提出來還是外國人發起或中外人士合作的集體產物，目前還無法定論。

④ 宋如海編：《我能比呀：世界運動會叢錄》（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⑤ 詳細經過參見Xu Guoqi, "Sport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National Representatio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1932, 1936, and 1948 Olympic Games",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5, no. 1 (2008): 1-24。

⑥ 有關「兩個中國」和奧林匹克運動關係的詳情，參見Xu Guoqi, "China's Nation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wo-China Question in the Olympic Movement", *China Perspectives* 73, no. 1 (in both French and English editions, 2008): 19-28。

⑦ 有關足球和中國國家認同的關係的詳細解釋，參見Xu Guoqi, "The Goal China Can't Reach", *Washington Post*, 27 July 2008, B01。

⑧ 有關中國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問題與國際化關係的論述，參見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譯本參見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三聯書店，2008）。

⑨ 關於體育與政治之關係，參見Xu Guoqi, "A Sports Revolution?", *Asia Weekly*, 28 April 2008。

⑩ 有關中國尋求國家認同的歷史軌迹宏觀論述，參見Xu Guoqi,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A Speculative Essay", in *Harvard Vision: Student Essays on Our Collective Future*, vol. IV, ed. Peter Ulric Tse, Jeremy R. Gray, and Frank Pasquale (Cambridge, MA: Dipylon Press, 1996)。

⑪ 參見Xu Guoqi, "A Delicate Balance", *New York Times*, 4 August 2008, H03。

在中國人終於實現「奧運三問」所有目標之際，該是重新審視檢討一百年的國際化軌迹，思考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的國家認同的時候了。國際化的真諦首先是中國化，中國化是國際化的終極目標。

徐國琦 美國Kalamazoo College講座
副教授，2008至2009年度哈佛大學
Radcliffe 高級研究院研究員。